

回顾‘抗大’生活

——● 郑 昭

作者简介：郑昭同志是福鼎市前岐镇桥亭村坪尾自然村人，离休干部。1935 年参加“一二·九”运动，先后担任过文化教员、政治宣传干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部宣传部干部教育助理员、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兼院党委秘书、军事医学科学院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及院务部顾问。1955 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57 年 6 月 18 日被国防部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

我已是古稀之年，至今我保存着一件珍贵的证件，它伴随我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革命历程，每当我看到它，就想起那艰难困苦的岁月，想起那烽火连天的战场，想起那同甘共苦的战友们。多少年来，无论条件多么困难，我始终保存着它，它记载了一个青年革命的里程，它就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证书》。

事情要从 1937 年谈起。1937 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消极抗日的政策，致使我国丧失大片国土，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全国爱国同胞对国民党反动政府丧权辱国的卖国政策表现了极大的愤慨，纷纷进行各种抗日活动，青年们拿起武器，奔向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保卫祖国。

在这种形势下，我于 1938 年 8 月间，经丁元介绍，结识了抗日

军政大学四期毕业生胡锔同学。他向我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为国为民的正义主张，讲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奋勇杀敌的感人事迹，使我深受启发，特别是他向我介绍了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学习概况、学校生活等等，更使我无限向往，遂产生了前往陕北学习的念头。此时，我在湖南，苦于陕北路途遥远，且又经济拮据，无法前往。胡锔同学见我有意参加抗日救国斗争，想要去陕北学习，表示愿意为我作介绍人。几天后，我们一起到了八路军长沙办事处。办事处王主任询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王主任告诉我，去陕北学习的目的，首先是武装头脑，有了政治水平，认识问题才清楚，干革命才有思想基础；在学习中，要有吃苦耐劳，克服困难，过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我听了后，表示赞同。组织上同意保送我去陕北学习，发给我五元大洋做路费，并写了一封介绍信，嘱我到八路军汉口办事处联系。

9月初，我从八路军长沙办事处来到汉口办事处，在那里已集中有二三十位青年学生，准备赴陕北学习，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在汉口小住几天后，办事处为我们联系到一节车厢，以新四军教导队的名义编队，乘车前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临行前，办事处同志嘱我在路上关照一下大家的旅途生活，要顺利到达西安。当时，日寇正企图攻占河南郑州，再南下直逼武汉，形势是非常紧张的。我们出发后，一路上走走停停，行车非常之慢，到达河南境内潼关附近时，因日寇占领了山西风陵渡，过潼关有危险，列车不再前行，把我们这节车厢给甩下来，大家焦虑万分，惟恐被国民党军队阻拦，不能到达西安办事处。后来几经交涉，车厢才又挂上列车，于9月16日抵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这时，大家的心情才安静下来。

在西安办事处住了两天，正逢“九·一八”纪念日，我参加了纪念晚会。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聚集一堂，愤怒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一曲《松花江上》把晚会推向了高潮，我们共同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等口号 群情激愤 气氛热烈，大家都恨不得立即奔赴抗日救国斗争的最前线。这次晚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第一次受到深刻的抗日救国斗争教育，坚定了我的革命信念。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是共产党向陕北输送抗日爱国青年的一个中转站，这里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办事处的同志按我们每个人的意见，把我们编成抗大组和陕北公学组。我因同意先去陕公分校学习，办事处指定由我带一个组前往邑看花宫陕北公学校。1938年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政府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共产党，但他们却十分惧怕各地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斗争，一发现去陕北的青年学生，就扣留下来，送到河南洛阳国民党的军校去。那时的西安，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城门由国民党军队把守，设有哨卡，盘查来往行人。为了能顺利通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区，办事处的同志决定由我改扮成上尉军官，带领其他同学从西安北门出城。能否将这些人顺利带到目的地，完成交给我的任务，我自己也没有把握，一旦被岗哨阻拦盘查，后果很难预料。9月20日清晨 天刚朦朦亮 我们上路了，一行人匆匆来到城北 我走在队伍最前面，站岗的哨兵见我是上尉军官，慌忙向我敬礼，对我们未作任何盘查，便放行了。我心中暗自高兴，随即命大家快速行进。出城后，一路疾行 奔向渭水河边 直到过了河 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在后面几天里 我们雨天行军 翻越一个个深沟、陡坡 战胜了种种困难 大家互相帮助 互助鼓励 于9月26日到达邑看花宫陕北公学校 我被编入第43队。

在陕公分校我初步学习了《社会科学概论》 接触到一些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如何开展民运工作等，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经过短暂的三个月 学习于12月结束，我和部份同学编入抗大继续学习。12月下旬，我们从邑看花宫出发，东渡黄河去晋

东南抗大分校，北上行至郿县，发了套军装，在延川县东渡黄河。这段黄河波涛汹涌，水深流急，我第一次乘木船过黄河，小船在波峰浪谷中起伏，心里着实有些紧张，大家都坐在船中，不敢乱动。上岸后，继续向山西永和县前进，准备待机穿越同蒲铁路。住了两日，因日寇封锁了铁路线，无法通过，我们只得又返回陕北，到达延安清凉山下，我被编入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第四大队第一队，1939年1月正式开学，开始了在抗大的学习生活。

抗日军政大学，全名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它是于1937年初由“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称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抗大的教育方针，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抗大的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在延安举行了开学典礼后，即搬到延安东北方向的蟠龙镇去，大队部住在镇上，我们一队住在镇的西面的一个小山村——劳庄。这个村共有十来户人家，我们住的是老百姓腾出来的窑洞。我所在的一队是军事队，以学军事为主。除政治课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和民运工作等外，军事课主要是进行单兵训练，如何识别和利用地形、地物，以及学习班、排、连、营攻防战术原则，兵团概则，游击战等等。那时候，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艰苦，一无校舍，二无桌椅，一块木板，一个石墩，就是我们的桌椅，场地里，大树下，就是我们的教室。条件虽然很差，但大家都能自觉克服困难。我们还去背粮食，背煤炭，学习做饭，学习打草鞋等等。在毛主席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题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的号召下，我们上山开荒山，播种谷子，锄草，松土等一连串农活。劳动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但大家的心情是愉快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们这个班共有十个人，有来自学校的学生，也有来自旧军警的人员，但大家都不满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到抗大的。尽

管过去大家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但在抗大这个战斗集体里，有一个良好的风气 同学之间互谅、互让 团结奋斗 既锻炼了意志 又锻炼了体魄，学会了不少革命道理和对敌斗争本领，学会了如何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认识困难 克服困难。

在劳庄学了六个月，学校奉命向晋察冀边区东迁。7月间，我们从蟠龙镇出发 再次东渡黄河 到山西临县一带待命。在那里 学习约两个月，9月间，我们穿越日寇的封锁线。这是一次长距离的强行军，上级要求我们在一夜时间内急行一百四五十里，通过敌人封锁的一条铁路、一条公路和村里的碉堡封锁区。这次行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们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身体素质、军事素质都有所增强和提高，但用这种速度行军，从未经受过，同学们既兴奋又紧张。一天下午 太阳刚下山 部队出发了。开始，同学们比较有秩序，走了一段路程后，有的同学就渐渐地拉开了行军距离。不久 又是来了一段小跑步。大部队行军 要求既要快 又要保持安静 不能掉队 特别是夜里行军。我们借着月光 很快来到了铁路附近，这时突然从忻县方向沿铁路线驶来了日寇的一辆巡逻铁甲车 车上的探照灯四处照射。我们见状 就地卧倒 刹时间四周一片寂静 大家丝毫不敢乱动 生怕被敌人发现 惹出麻烦。敌人的巡逻车来回照射，没有发现我们，就慢慢顺着原路驶回去，我们快速通过铁路线和一条公路线，紧接着又从敌人的碉堡附近穿插而过。一路上紧张行军，有的同学开始掉队，为了能顺利完成行军任务 大家发扬了互助友爱精神 互相搀扶 互相帮助背背包 互相鼓励，终于在第二天清晨顺利到达预定地点，稍事休息后，继续向目的地前进，到达晋察冀边区境内。这次，我们将要征服的是晋察冀边区内的滹沱河。那天 正是河里涨水 我们要通过的这一段河，既无桥 又无船 全凭趟水过河。黄浊的河水 湍急的水流 趟到河中 水满到胸前 每前进一步 都非常困难 稍有不慎 就有被冲走

的危险，不少同学不识水性，我们只好把他们夹在中间，大家手挽着手，趟着急流前进，一部份水性较好的同学，在水中筑起一道人墙，保护着其他同学，终于安全渡过了滹沱河。此后，又经过几天行军，于九月中旬到达了晋察冀阜平陈庄、庄窝一带，完成了东迁任务。接着，继续学习训练。

1939年，日寇大举冬季“扫荡”，进犯晋察冀边区，我们也参加了反“扫荡”斗争，与日寇展开“麻雀战”，化整为零，同敌寇周旋于阜平的丛山之中。边区军民共同作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返回了原驻地，于1940年1月1日毕业。

在抗大一年里，经受了各种锻炼和考验。当我捧着毕业证书，心中无限激动。我深深体会到抗大真是一座革命大熔炉，它把我们这些不懂事的青年，培养成坚强的抗日战士，学会了革命斗争的本领，懂得了革命斗争的道理，坚定了革命斗争的信念。这一切，都为后来从事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1年2月25日于北京

（市党史研究室供稿）

礮溪桑园大捷

● 朱国营 口述 姚礼镛 记录

作者简介：朱国营（1915—1985年）福鼎市管阳镇金溪村人。1933年参加红军，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3年起历任柘荣县司法科长、监委主任、工会主席。1956年任福鼎县工会主席、县人委委员，1958年任福鼎茶厂厂长兼党委书记。

1935年国民党对闽东地区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企图消灭闽东的工农红军。我们纵队（闽东独立师）在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带领下，连续打败了国民党数次“围剿”。匪军连遭失败后，气急败坏，准备于5月12日乘我部队整休时，向我苏区反扑。

在群众帮助下，我们得知了匪军的阴谋。5月11日晚，叶飞、陈挺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反“围剿”方案，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英勇作战，保卫苏区。当晚8点钟，我们第一纵队在叶飞、陈挺带领下，经福安、柘荣、管阳，披荆棘、绕小道，连夜急行军，速行100多公里，于次日晨四点钟赶到目的地——福鼎礮溪桑园村。我们分为三个支队，埋伏在桑园枫岔头。第一支队由陈挺指挥，担任正面狙击。行军中，叶飞、陈挺等总是跑在前头，一路上还帮助新同志、小战士背行装。

桑园是霞浦到福安的必经之道，四面环山，山势险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行，犹如葫芦，易进难出。我们埋伏在枫岔头的半山

腰处 居高临下。早 6 点时，敌人大摇大摆地向我埋伏方向开来。敌军到达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远的山沟沟时，陈挺一声令下，子弹、手榴弹像雨点般地飞向敌人。敌人乱成一团，四处逃窜。当他们想往回撤退时 又被我二、三支队拦腰截断。消灭敌人约一个连 打死保安旅一个连长。我班战士周开会在战斗中奋勇直前，冲下山去与敌人肉搏，用手榴弹、刺刀和枪托一连消灭了十几个敌人，使敌人魂飞魄散。他的双腿负伤。我们缴获步枪 100 多支 轻机枪 2 挺 手提式冲锋枪 1 支 短枪 10 多支 手榴弹几百枚 还有弹药等其他物资。我方五位同志负伤。这次战斗大大振奋了全体红军游击队员的革命斗志。

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扶老携幼纷纷向我们慰问，送来鸡蛋，端来茶水 我们只喝了茶水 不收食品。当天下午 我们怀着胜利的喜悦在叶飞、陈挺带领下 奔向新的战场。

（朱乃德 供稿）

回忆 三次战斗

朱国营

我于 1933 年 12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闽东游击队。1934 年 5 月 14 日凌晨，闽东独立师二团（红二团）在叶飞、任铁峰、叶秀蕃、陈挺等率领下，在福鼎游击队配合下，分兵三路向秦屿镇进发。国民党县保安队和三沙海军陆战队一个加强营的兵力支持林步蟾反动势力，凭借地势，组成火力网，阻止我军前进。下午我军到达太姥山下，包围了秦屿镇，用机枪掩护战士前进，战斗了二个小时，消灭了敌人一个营的兵力，缴获德国造步枪 24 支，七九步枪 26 支，轻机枪 2 挺，子弹 200 多发，俘虏 50 多人，残敌向霞浦县逃窜。

1935 年 6 月 4 日，闽东红军独立师特务队 40 多人乔装渔民、樵夫，由鼎平县委所属的平阳游击队林辉山等带路，在拂晓 4 时左右包围了沙埕镇。沙埕有敌人的二个排兵力（保安、当地民团各一个排），红军一声令下，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红军特务队短枪队冲进敌人据点，经过一个半小时战斗，打死敌人 10 多人，俘虏 20 多人，缴枪 70 多支，手榴弹 100 多枚，子弹 1000 多发。我们把枪械带走，将枪套扔到海里。俘虏不愿参加红军的，发给路费。澳腰敌人赶来增援时，我们早已撤离。

还有一次是亲母岭战斗。1936 年 8 月，国民党提出与闽东叶飞谈判。敌人此举是察看我方虚实，以便突然袭击。闽东独立师将计就计，在宁德亲母岭小村庄布下疑兵一个排，在离小村五里路处

隐蔽着 300 多名兵力。国民党军统特务王调勋在村里住了一夜赶回周宁县城。第三天拂晓，省保安旅旅长黄苏派遣参谋长率两个连从宁德县城来我军驻地“进剿”。敌军一离开县城五六里路，我党交通站一站接一站迅速将消息传递到我军。红军独立师主力第二纵队决定在亲母岭伏击。18 日，红军在离亲母岭五里的邑堡村过夜。叶飞、阮英平、陈挺等亲临阵地部署兵力，并发动群众准备好土炮、鸟铳等埋伏亲母岭山尖。我军第二纵队分兵三路狙击。等敌人靠近时，首长一声令下，枪声大作，敌人乱成一团，争先逃命。陈挺纵队长带领战士，冲锋陷阵，消灭敌人。我班战士余步利扎起七八个手榴弹冲进敌群，只听一阵爆炸声，敌军死伤 4 人，余步利的脚也受伤。战斗从中午开始，继续了三个小时，共击毙敌军 40 多人，生擒敌连长等 70 多人，缴获托铜枪百多支，轻机枪 2 挺，手榴弹 10 多箱，子弹 5 千多发和其他用品。

（朱乃德 供稿）

两次出国抗美援朝

汪敬礼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国青年响应祖国的号召，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当时我正在土改队集训，串通了三位管阳籍老同学卓朝清、朱义邦、汪涵参加了军干校——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通信学校，前往四川广安县、重庆市等地学习。毕业后，我分配到西南防空处。不久，我们八九个骨干分子随部队开到辽宁省鞍山市，保卫鞍钢，待命入朝。

1953年4月下旬，一个明月高照的夜晚，我所在部队从鞍山出发了。坐火车越过了鸭绿江。路经我国的丹东市到朝鲜新义州市。丹东市容繁华，灯火辉煌，而新义州没有一座完整的楼房，一片残垣断壁。田野里，一位老大

娘背着孩子在犁地，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在前面拉着犁，顿使我眼眶润湿了。车又向前走了一段，一位朝鲜妇女死在路旁，可能是美国飞机扫射中弹而死的，还没有来得及收埋。朝鲜人民尽管饥饿，但却把粮食送给军队，自己常去剥取桦树皮的内层来充饥。朝鲜人民勤劳、善良，与我们相处极好。我们从阵地回来，经常是一身湿漉漉，换下衣服扔在走廊里。老大娘见到就拿去洗了。我们以毛巾、肥皂答谢，她也不要。由于相处亲密，我们半年后也会讲朝语了。

5月4日那一天，打了一仗，一架敌机冒着浓烟飞向西海岸，部队派了一辆车去追踪。晚上我与几位战友和翻译就在平壤郊区一位教师的山边简易房借宿，房间极窄小。他们非常热情，教师去学校借宿，妻子孩子挤在一边，我们挤在另一边，真是感人至至。

我们部队任务是在介川、清川江一带保卫铁路桥。那时我们没

有探照灯，为避免晚上遭轰炸，打一战就转一个阵地。我们团在三个月里就击落击伤敌机 28 架。7 月 27 日美国就乖乖坐下来谈判。喜讯传来，到处是欢快的锣鼓声。我们敢于藐视敌人，人人争取立功。

谈起从丹东到平壤这条运输线也真神。日间汽车伪装隐蔽，晚上开车，不开灯，像长龙一样连绵不断。原来是每辆车上都配有正副驾驶员，当地的哨兵一听到敌机声音就放枪，驾驶员听到枪声就关灯，由副驾驶员拿着白旗坐在车前的档板上，白旗左右移动，驾驶员的方向盘也跟着移动，这样驾驶员不开灯也照常开车。志愿军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前方的供应。

15 年后的 1968 年 10 月，我调到一个高炮团，又一次出国开赴越南外苏一带抵抗美国侵越军队。

由于越南当局追随苏联 与我们关系淡化 有意让老百姓远离我们，公安人员处处监视。有次我与领导下连队，路上遇到一位邻居老太太在割稻，老太太开玩笑地示意下田帮她割稻，我俩就下田帮忙，结果老太太被公安禁闭了十多天。但我们与越南人民始终心连心。当时我们的高射炮很落后，是 30 年代的老家伙。针对敌机能超低空、超音速飞行 我们采取远距离、高密度的空中监视 提前几秒钟射击等战术手段，也很快使美军的子母弹失去威力。最后用无人驾驶飞机，但也逃不脱失败的命运。

每当回想起参加这两次战争，我激动的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

李海传略

● 市政协办公室

李海，字振东，福鼎市贯岭镇茗洋村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7岁入学，15岁随塾师转学于泰顺、平阳等处。民国十二年（1923）报考桐城第三高小，校方以其年龄太大拒收，后得第一高小校长林鹤樵应允方得入学。次年秋，李海因福鼎南北派学潮受累被开除学籍。民国十四年（1925）其母典卖耕地得款20元，供他赴福州应试。他考入农林中学。同时又兼读福州第一高中课程，终在取得初中毕业文凭的翌年，毕业于福州第一高中。

民国十八年（1929）李海返乡，应聘为沙江小学（即沙埕小学）教员，与郑丹甫共事，二人过从甚密。不久，他到福建省行政人员训练团禁烟班受训，结业后，被任命为闽侯县政府禁烟（鸦片）科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返乡任福鼎县政府出纳员。民国廿七年（1938），在共产党人郑丹甫引导下参加革命活动，同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民国廿八年（1939）中共浙南特委组织部长林辉山来鼎活动被捕，他协助中共福鼎县委组织营救，获得成功。

民国卅五年（1946）李海根据福鼎县特派员郑衍宗的指示，参加福鼎县副议长竞选，当选为副议长。任职期间，他以副参议长职务为掩护，先后从国民党搜剿队长林德铭、前岐镇长魏伯乾手中救出中共交通员洪仕月、进步学生王祖丹及革命群众数十人，并掩护中共浙南特委妇女部长陈碧如及共产党人林永中的斗争活动，同时还通过各种秘密途径，经常向中共地方党组织提供军政情报。

1949年6月，福鼎人民政府筹备委员会成立，李海任税捐稽征处负责人。他大胆起用素质较好的原国民党税务人员，沿袭旧税目调整征免范围很快把工作纳入轨道有力地保证了地方供给。半年后，他调到福鼎茶厂，负责茶叶出口装运。时适有运送包装纸的船只触礁落海，他沿海奔波查找，终于如数追回失物。

1950年4月，李海当选为福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并历任福鼎县第一届至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3年李海当选为福鼎县人民政府委员，并历任第二届至第五届福鼎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8月，政协福鼎县委员会成立，他任驻会副主席。1980年12月当选为福建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4年7月离职休养。建国以来他为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统一战线等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李海被诬为“叛徒”、“内奸”、“反革命”遭受精神和肉体折磨被下放到店下、白琳、翁江茶场等地劳动。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其冤案始得以平反昭雪。1985年恢复了党籍。

1987年，他身患高血压病，仍扶杖参加各种会议，接受采访、咨询，参与地方政事。12月因中风抢救无效逝世终于86岁。家属遵其嘱火化，首开福鼎县领导干部火葬先例。

追忆先父二三事

——纪念李海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李行 李微 李仁 李端

先父李海先生生于1902年卒于1987年享寿85岁。生值乱世出于贫寒幼慕昔贤耕读自强。献身革命许国驱驰临深履薄艰险不辞。虽一生屡遭磨难历尽坎坷温于群小受侮不少然其爱国热忱、耿直秉性、坚毅品格、朴质作风、忠孝涵养、清廉志向，一以贯之至死不渝。处世为人诚真坦易有口皆碑素著赞誉。福建师大黄寿祺教授在为先父诗集《闲窗吟稿》的题词中概括了其一生：“爱国从来不后人，齐家况复善亲亲。”福鼎县委、县府在隆重的追悼会上给予“两袖清风”的定论。《县志（初稿）人物传略》中也作了客观恰切的评价。其生也艰，其死也荣，是其幸耶，抑其悲耶？在“无草不死，无木不萎”的恶劣年代能顺应变故，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在“骄人好好，劳人草草”的颠乱时期，逆锋冒矢竭己之力；“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奉为份内之责。在自身蒙冤被祸之日，“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硬骨疏狂不折腰，挺胸任谩舞群妖”是其真实写照。今值先父诞辰一百周年追忆往事，历历在目。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谆谆教诲，育我恩多。永怀永伤，昊天罔极，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谨录数事以念以志。

笃友情 重然诺

先父秉承古人遗风慷慨应诺乐于助人。解放前置自身安危于度外，冲破种种险阻，将数十名革命同志、革命群众从反动派魔爪下保释出来，救命活人，功德无量。如进步学生王祖丹被国民党福鼎县搜剿队捕去，严刑逼供，灌辣椒水，使之头肿如斗。先父得

悉 往寻搜剿队长林德铭 适林正搓麻将 就在旁观察以待时机 等到林连和数局得意忘形时，先父才上前言明欲保王出狱，并指出王系学生 不能用刑。林正在兴头上 答应放人 但随即威胁道：“你告诉他们，我没有灌学生辣椒水，但不是我不敢灌！”先父恐其变卦，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保结，要林签字，并立即前往溪岗碉堡接人。1938年9月，陈伯恭（后改伯弓）同志要做伪县长陈廷桢的工作，因与陈不相识，要先父介绍引见，先父为陈伯恭大无畏精神所感动 慨然应诺。见面后 伯恭慷慨陈辞 纵论国内外形势 针砭时弊，晓以大义，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伯恭辞去后，伪县长不禁赞叹道：“这个教员学问倒不错啊！”一个月后的一天夜间 伯恭又邀先父一同去见伪县党部书记丁梅薰，伯恭直陈伪党和伪政府的腐败事实 有根有据 不容置辩 说得丁梅薰无话应对 只能频频点头 当面承认国民党如不亡 实在是无天理。诸如此类事例 不胜枚举。先父这种重然诺 笃友情的品格 至老犹然。1985年 黄寿祺教授来函谈及福鼎著名诗人杜琨（字悦鸣）的遗孀王宝祺景况凄凉，王宝祺以前曾在福鼎礐溪任教，1955年被不合理退职，现老病缠身 生活无着 希望先父能代为奔走落实政策 使老人能安度晚年。先父受托后，不顾年迈体衰，且手腕骨折伤残在身，几番寻访当年礐溪校长了解情况，并多次向县教育局、县委、县政协领导反映，但因年代久远，难以调查核实。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蒙领导批准给予生活补助费 300元。事情虽不算圆满 但由此可见 忠人之托 仗义执言 先父一生都在身体力行。

受诬不屈 善于斗争

1952年下半年“三反”运动开始。由于先父任过县税捐处长和县公营运输公司会计，被列为贪污嫌疑对象，当作“老虎”来批斗。但先父一贯廉洁奉公，并无中饱私囊之事，故坚决不承认有贪污行为。批斗者斥问：“税捐处和运输公司 大部分人都有贪污 你身为领导为何没有 应该坦白交代 争取从宽处理。”对于这种无理的话难、荒谬的逻辑 先父愤然答辩道：“我不贪污 究竟行不行 如

果行 你何必斗我 如果不行 我现在要贪污是来不及了 任你们怎么处理就是了。他们认为先父刁顽，一直隔离批斗四个多月 终因调查不出有贪污迹象和证据，只好作罢。

“文革”中 先父惨遭摧残 扣上种种莫须有的可怕罪名 关入牛栏 残酷批斗 日夜逼供 险些被枪毙。但先父始终坚持一点 再苦再难 心中信念不变。相信共产党最终会纠正错误 恢复正义。假若当真永远是这样子，我虽被斗到死，而它本身也是不会长久的。现在虽然处在黑暗之中 总有一天会出现光明。当定为“反革命、内奸、叛徒”的结论与先父见面 并令文字表态时 先父内心虽有说不尽的冤屈，但在当时的形势下，申诉不仅毫无作用，反而徒自招辱，于是拿起笔来写道：“班部同志 如按党的政策给我定了罪名 我就完全同意。”这就为以后平反昭雪、推翻原案埋下伏笔：事实证明，给先父定的罪名，是完全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政策精神，因此不能同意。受诬不可屈服，斗争还需策略，这是先父留给我们的一条经验。

一生勤劳俭朴，不失农家本份

先父生于农家 吃苦耐劳、俭朴持家是其本份 终其一生 未尝或忘。1951 年在公营运输公司和县联合诊所任会计时，因家庭人口多 母老儿小 生活困难 遂向县农会承租南校场农地一亩多 利用 礼拜天及下班时间种地瓜、蔬菜，补贴家用。大跃进后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全家饥肠辘辘，先父就带领我们到溪边乱石沙滩地上垦荒 种植番薯、荞麦、芝麻、绿豆等作物。还到温德奎同志任院长的养老院后门山坡上借得一块荒地，种上藕芋，收成后磨成粉 以补食粮的严重匮乏。“文革”期间 先父已年近七旬 先后被押送到玉塘老区茶果畜牧场、翁江茶场、竹脚湾茶场等处改造，终日从事开荒、种菜、拉粪车、喂猪、洗猪圈、运石砌墙等重体力劳动。如果不是从小惯干农活，以古稀之年的衰体，必然难以承受重负。先父生活极其俭省，一生操劳至勤，自奉却甚薄，绝不允许浪费现象存在。餐桌上的饭粒必捡食干净，甚至溅溢于桌上的汤汁，也用口